

戰後臺灣民俗文化研究

文·圖片提供／謝宗榮（民俗與宗教文化研究者）



▲彰化花壇上元迎花燈。

臺灣社會中人數最多的漢人族群，雖然都來自於中國大陸地區，但是在數百年來的移民開發過程中，為了因應臺灣這塊不同於閩粵原鄉環境的土地，逐漸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俗文化。

漢民族在臺灣的發展可追溯自明末清初時期，先民在入墾這塊土地之時，很自然的將原鄉的信仰習俗一起帶來。但在三百多年來的社會發展與變遷之下，使得這些信仰習俗的特色，由早年的「內地化」逐漸轉變成「在地化」，這種轉變也十分忠實的反映在宗教信仰、生活起居等範疇的各種民俗文物之中。

臺灣民俗文化的研究，截至

當代已累積了相當的成果。早年的民俗研究，多偏向於風俗、歌謠方面的記錄。早在清領臺灣時期，各府、縣、廳志大都闢有「風俗」專篇，而寓臺的官員、文人等，也在個人的筆記、雜記中對臺灣風俗有所描寫。日治之後，一些日本學者在人類學或民族學、民俗學的基礎之下，開始對臺灣的民俗作較為精確描述的調查記錄，如鈴木清一郎著有《臺灣舊慣習俗信仰》，片岡巖著有《臺灣風俗誌》，國分直一著有《臺灣的歷史與民俗》，而人類學家伊能嘉矩也在他的巨著《臺灣文化志》中描述了臺灣的民俗文化，都為臺灣的民俗研究

立下了重要的基礎。

然而相對於這些日治時期客觀研究的成果，本地文人反而多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，對於臺灣的民俗現象有所批評，如曾景來的《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》，連橫的《臺灣風俗》等；但橫跨日治和戰後時期的吳瀛濤以及《臺灣民俗》期刊中的許多作者，則吸收了日本民俗學研究的觀點，對臺灣的民俗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
戰後的臺灣民俗研究，就在日治時期研究的基礎之下，持續出現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。戰後初期中的許多研究者，仍是延續日治時期的研究，如吳瀛濤的《臺灣民俗》、王詩琅的《艋舺歲時記》、廖漢臣的《臺灣的年節》，以及吳槐、黃得時、林衡道等人。不過這群橫跨兩代的本土民俗研究者，多為文學家或史學家，尚稱不上是專門研究民俗的學者。

1960年代以後，臺灣本土才出現一些專門研究民俗的學者，如留學日本的劉枝萬，在地方志的編纂之餘，以民俗學觀點對臺灣的宗教信仰、祭典等做了十分忠實的調查，留下許多寶貴的紀錄，結集成《臺灣民間信仰論集》等書。臺灣所培養出的第一代人類學者李亦園、阮昌銳等人，以文化人類的觀點累積了許多臺灣民俗研究成果；而藝術學者施翠峰（《臺灣民間藝



▲臺北市國際龍舟賽。

術》等）、劉文三（《臺灣民間藝術》等）、宋龍飛（《民俗藝術探源》）等人，則在民俗藝術研究之中，對於臺灣的民俗文化有所著墨；歷史學者林衡道（《鯤島探源》等）、洪敏麟（《臺灣風俗探源》等）等人，則是立基於史學家的觀點，接近於清代以來「方志」編纂的風格。

接續以上戰後第一代本土的民俗研究之後，新一代的民俗研究則可概略區分為兩個範疇，首先是人類學、文學、史學等學術領域中對於民俗的研究，如人類學者林美容、張珣等人，以研究宗教信仰為主體；歷史學者如丁煌、石萬壽、何培夫、蔡相輝等人，以研究寺廟史、信仰史和風俗史為主體；中文學者如李豐楙、林明德、徐福全等人，以民俗文學、禮儀等為主要研究方向；而文化官員如陳運棟以研究客家禮俗為主，簡榮聰以研究民間風俗和民俗文物為主，楊炯山以研究生命禮儀為主。

秀娥（《臺灣傳統生命禮儀》等）、謝宗榮（《臺灣傳統宗教文化》等）等人，雖然各有不同偏重的研究領域，但都為當代的民俗研究留下重要的成果。

考察臺灣的民俗文化，雖然在諸多社會變遷因素影響之下，形成與原鄉之間互有異同的生活習慣，顯現出各有異趣的生活心態，但在這一變動的現象之下，卻仍舊存在一種較為穩定的結構。此一文化結構應是主導人們精神生活的內在力量，也相當深刻的影響廣土眾民的生活方式及生存心態。這種文化結構所反映出的民俗精神，一方面從民俗中的諸多事項中看出，諸如：社會族群關係、聚落發展、生命禮儀、歲時節令等方面；另一方面則可以從豐富而多元的民俗文物中得到具體的印象，反映出常民的宇宙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與審美觀。



▲臺南開隆宮「做十六歲」——鑽七娘媽亭。



▶頭城中元搶孤——爬孤棧。